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Zhongguoshidaijingjimingjiakingdianwencong

高尚全

经济文选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Zhongguoshidaijiajingjiaxingjiaduan Wencong

高尚全

经济文选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尚全经济文选 / 高尚全著.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1.1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 张卓元等主编)

ISBN 978-7-5119-0329-7

I. ①高… II. ①高…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3718 号

书 名: 高尚全经济文选

出 版 人: 宋灵恩

作 者: 高尚全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政编码: 100044

发行热线: (010)68320825

传 真: (010)68320634

邮购热线: (010)88361317

网 址: 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scj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18 千字

印 张: 18.2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9-0329-7

定 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编委会

主 编：张卓元 周叔莲 吕 政 汪海波

编 委：王梦奎 厉以宁 刘 伟 刘国光 刘诗白
吴敬琏 陈佳贵 冒天启 洪银兴 黄 达
蔡 昉 薛小和

（按姓氏笔画排序）

策 划：宋灵恩 海 土

自序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业已形成；社会结构从城乡二元化结构演变为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各个利益主体具备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人民生活从贫穷步入小康，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显著提高；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示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标志着中国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迈出了重要步伐。认真总结好30年来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我们走好以后的道路尤为重要。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解读过去的历史，也不能用先验的教条来评判这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而是应该老老实实在地回到历史现场，深入挖掘历史的证据，透过历史的表象，总结出推进这一历史转变的重要经验，以期为今后的道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对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回顾总结与梳理，对我来说，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责任。这30多年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期。我从1982年奉命调往原国家体改委工作，三年后被任命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虽然工作岗位几经变化，但主要研究领域一直与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相关，有幸成为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亲历者和改革决策过程的参与者。我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建言献策，并有机会参与了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包括三次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次十五大报告、一次中共中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一次中共中央关于第十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建议。此次收录的近40余篇文章有些是在报纸杂志公开发表过的，有不少篇是没有发表过的，还有些是我对中央的建言献策。其中有不少文章的主要观点或政策建议被中央采纳，对改革的进程进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本文选主要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时间跨度从1986—2010年，以“改革”这条主线贯穿其中，这样做有利于反映自己的探索过程，也可以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出经济改革的进程。文章选择的标准，是当时对改革起过积极作用的，有一些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被吸收到中央文件中去，有一些在《人民日报》或其他报刊上发表后，在《新华文摘》上转载。这里有关于实际情况的调查，有在不同场合所提的关于改革的政策建议，有对现阶段改革的理论上的探索，也有用

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于中央改革决策的解读。从内容上看，尽管这些文稿内容涉及改革理论、企业改革、宏观调控、政府改革、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同一条主线，即思想解放与改革发展，反映了我对经济改革的思考以及和推进改革有关的工作经历。

由于所收录的每篇文章的成文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为了保持原文的风貌，本次收录只是对原稿中的个别地方做了文字校勘工作。今天重新审视这些见解和主张，有些已经在实践中解决了，有些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也有些问题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不复存在。不同阶段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认知水平，从中也可以看出我本人的思想认识以及我国改革不断深化、思想不断解放的轨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个人的努力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希望本书的出版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和研究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参考和借鉴，同时也作为我在改革开放事业上继续前行的起点。

高南金

2010 年 8 月 3 日

站在改革理论前沿的经济学家

——高尚全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决策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存在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张皮”的现象，经济理论界也不例外。能够把经济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融会贯通，经世致用，可以在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方面起到一定作用的经济学者还不多见。但是，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高尚全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高尚全这个名字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决定中国改革和经济走向的四个重要历史关节点的会议：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他亲历了后三个会议，并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工作。20多年来，他一直为中国经济改革鼓与呼，为市场经济加油鼓劲。

早在50年代，他就指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高唱“企业自主权”

1929年9月出生于上海嘉定的高尚全，少年时敏而好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同时，他也关心现实和历史，师长们的言传身教，嘉定人民抗倭患、反“三屠”、战日寇的壮烈史实，激发了他爱国爱家、追求进步的热情，萌生了“干国家事”和终生进取的愿望。1952年，高尚全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门，从事经济政策的研究工作，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

读经济学科班出身的高尚全刚跨出校门不久，就进入政府机关工作，这为他在接触并研究国家经济政策方面提供了一定条件。但是，应该说，50年代探讨和研究经济问题的环境并不宽松，主要是受苏联传统教科书的束缚及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没有清楚的认识，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的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简单地甚至盲目地模仿了苏联模式，从实践到理论概莫能外。

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参加工作不久的高尚全没有采取淡漠的态度，而是一头扎进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和思考中去，针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较早地提出了“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的建议。

在企业的现象令他奇怪，而部招待所就更使高尚全感到震惊了。他发现招待所永远是满满当当的，天南海北，住的全是部属企业来京办事的。和企业来人聊聊，高尚全才知道，电、煤等原材料没有了，企业要来人；生产任务没有了，企业要来人；产品卖不出去了，企业要来人；企业内部要修个房子、提拔个干部，当然更要来人。为此，许多企业就常派专人盯着部里。人来了，请示报上来了，也不是一帆风顺，还有好几道关卡。先到对口局，科员—科长—处长—局长，再到部机关，又要经过层层审批，少了哪一关都不行。高尚全把自己的疑问和思考一股脑地倾注于笔端，《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一气呵成投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仅发表了，还配发了《“必要”的手续》这样一幅漫画。

第三，助长了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

1988年，当高尚全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率团访美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Willia William Draper 热情地告诉他：你的文章已被联合国翻译成英文，还加了序言；并由衷地称赞他“不愧是中国前驱的经济改革家”。

深入调研，冷静思考，积极投身改革

《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发表后，引起企业界和社会各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但是，这一呼声很快在批判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后来的反右运动、“文革”中销声匿迹了——因为高度计划经济的“纯”社会主义不允许任何“干扰”。

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很不正常的年代。在中华民族这段艰难的日子里，理论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竟成万马齐喑，于是，有的人消沉了，有的人随波逐流、不思进取，有的人则翻云覆雨……但是，高尚全却进入了冷静的思考和学习当中，抓住一切时间进行观察、学习、总结。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根据农村调查的经验，与其他同志一起大胆地提出了要恢复自留地和农贸市场、允许农民饲养大牲畜的主张；后来，又提出允许农民购买手推车，以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意见。

在这20多年中，高尚全先后在一机部、农业机械部、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默默地工作、学习，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数十年研究不辍。由此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现实选择与实践有了相当真切的认识，使之成为坚定、积极的改革者。正是凭着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自己长期的辛勤努力，加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调查研究，他才能够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高涨的热情和敏锐的洞察力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仅在1979—1984年间即发表文章40余篇、专著一部。也正是这样一段经历，促使他特别注重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注重现实经济政策的适应性，并努力从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做到不温不火，以促使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1982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从事中国经济改革方案设计的专门机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应运而生，高尚全也从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调到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室工作，后来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开始了他从事经济改革总体研究与实践的生涯。

高尚全认为，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项伟大试验，必须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认同和参与；同时，也必须促进港澳台、海外人士的广泛了解，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全面、真实、清楚的理解之后，他们就会以投资、贸易、宣传等各种方式回报改革。因此，无论是代表国家体改委在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

还是率团参加国际会议或考察，都成了他宣传改革的舞台。

但是，仅有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改革不断提出新问题，改革理论需要不断得到深化和提高，因此，单纯依靠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改革者必须时刻关注决策者、经济学家群体的力量，关注全社会对改革的认知和预期。高尚全出任体改委副主任后，除日常工作外，从未中断过对国情、对改革的深入了解和思考，他知道，在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上有所提高和突破，比出台几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更具意义和威力，所以，深入研究改革理论中的难点问题，时刻关心社会尤其是经济界思索的目标和兴奋点，把它们转化成切实可行的改革政策，是经济学家的重要责任和义务。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商品经济”这个名词已很少被人们提及。可是，谁又知晓，当初将之写进中央《决定》的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体制变革首先从农村展开，“大包干”、“责任制”，使农民对土地的耕种有了自主权，也极大地调动起了积极性。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也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通过放权让利，逐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实行了6年多，经济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以及忽视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等体制性原因，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中央高层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决定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予以解决。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文件，对全党起个巨大的鼓舞作用。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同志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开始，组织了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高尚全受命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当时，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商品经济。30余年的实践使人们深刻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但如何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呢？60年代初，广东学者卓炯就首先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1979年，国务院财委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曾提出：我国的计划经济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把企业从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改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1979年9月，经济学家薛暮

桥在一次座谈会上作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说明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4年7月，马洪也指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是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限于当时政治环境，这些见解当时并未立刻被大部分人接受，也未纳入中央决策。

在参与《决定》起草过程中，高尚全竭力主张把理论界讨论商品经济的成果变成中央的共识，写进中央的《决定》。高尚全深深感到，从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比较重视和放手搞商品经济了，哪个地方的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老百姓日子就比较过好。但起草小组有的同志持反对意见，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是担心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认为最多只能写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实，既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经济。

面对许多老资格，在商品经济概念多次被否定的情况下，高尚全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组织召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会议于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饭店（当时叫做西苑旅社）召开，童大林来了，董辅弼来了，蒋一苇也来了，一口气来了近20位思想比较活跃开放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高尚全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

经过倾听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和建议，高尚全决定把专家讨论的结果反映给中央决策者：

第一，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绝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第三，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这一建议引起中央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把商品经济的概念吸收进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中。1984年10月20

日，在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高度赞扬《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由于对改革理论与实践的贡献，1985年，高尚全被任命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开始直接参与改革的设计与指导工作，他的后半生也因此贡献给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事业。

计划与市场关系之争：十三大前夕向中央直言：希望在改革的理论上有新的重要突破

计划和市场的争论由来已久。1902年，那位并非共产主义者的普通学者提出计划这个概念时，并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这层含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标签是后人给予的，并一以贯之。

1986年，已经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尚全带队去匈牙利、南斯拉夫考察，目的是了解他们在改革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不仅深入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交谈，还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部委领导、专家学者对话，讨论改革过程中的得与失，交流改革面对的难题和经验。匈牙利主管计划的副总理说：匈牙利通过国家计划局编制和下达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有的企业完成500%，有的连10%都做不到，但是谁也没有责任。而在捷克则看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捷克的“拔佳”皮鞋很有名气。实行计划经济之后，名气没有了，国家计划部门按照每人每年两双皮鞋的预案下达生产计划。企业是将皮鞋生产出来了，但因为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式样、尺码，最终造成大量积压。由此看来，这种简单的计划做法十分可笑，计划的结果就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十三大前夕，高尚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希望在改革的理论上有新的重要突破——对十三大报告（征求意见稿）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一点意见》（1987年），建议在改革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针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错误论点，高尚全直言道：

第一，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属性；

第二，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第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都会发生变

化。从实物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

这份建议报告经当时的体改委主任李铁映转报给中央，有幸被吸收进十三大报告之中，推动了改革理论的发展。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

站在历史的高度，十三大报告为中国经济改革画就一幅动人的图画。但改革永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永远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两年之后，理论界在经济思想上出现了回潮，又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说法，强调“指令性计划”，说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市场调节为辅”，是把市场调节作为一种手段为我所用。

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手段，二者并不能匹配。高尚全一直坚持“计划”和“市场”是可以相结合的。他用城市的起源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城市就是“城堡+市场”，有商品生产就有商品交换，就产生市场，也才有了城市。市场是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独有的。社会主义也叫“城市”，而并不是叫“城计”。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经济体制改革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有了科学的结论。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小平讲话一锤定音，为这场争论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深入研究，突破禁区，为“劳动力市场”正言，高尚全列席中央常委会上，一口气举出五条理由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并没有明确其内容和实施步骤，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才回答了这个问题。

高尚全也参加了这次《决定》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下分有三个分组，高尚全负责市场体系这个分组，成员有郑新立、张卓元两位同志。“在起草工作中，我建议把劳动力市场写进报告。但压力很大，有的同志反对这种提法。”高尚全说。

那么，为什么要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概念呢？这与人们对社会主义同

资本主义本质差别的传统认识有关。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因此不存在劳动力市场问题。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全部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由市场合理配置资源已成商品经济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高尚全总结了人们对劳动力问题的认识，指出劳动力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和其他生产资料有效结合，才能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三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决定》送审稿。作为文件起草小组分组负责人，高尚全列席会议。在这种高规格会议上，为了能使劳动力市场写入报告，高尚全心血来潮发了言，并一口气列出了五个理由：

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劳动的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把劳动者去作交换。劳动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因此反映它的价值也是有大小的。

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必须使要素进入市场，如果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要素不能进入市场，那么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

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

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

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为什么呢？因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是个整体概念。过去，我们混淆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认为我是工人，我就是主人，我就是领导阶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中国的出租车司机为什么服务态度欠佳，是因为他们总在想，我是领导阶级，我为什么要给你开车呢？”高尚全说。

“过去我们对劳动力的配置方法都是依靠行政手段，这里面存在运气，也存在领导的好恶。其弊端我们已经很清楚。劳动力和人才一定要流动，而流动就一定要通过市场来解决。在市场当中，企业和劳动者都可以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双向的选择。也只有在劳动力市场当中，劳动者的素质、价值才有可能通过市场的配置，获得更准确公正的评价，才有可能使得劳动力资源和整个社会资源实现真正的优化配置。”

很快，中央常委会经过讨论研究，吸取了高尚全的意见，就这样把劳动力市

场的概念写进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又一个理论禁区被打破了！人们高兴地看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改革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

任重道远，走向世界，预见性地提出密切注意国际汇市动向、防止国际游资冲击港元

1993年，高尚全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岗位卸任。无论身居要职还是离开政府部门，高尚全的后半生注定了与改革的进程和前途共命运，注定了他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事业摇旗呐喊。就在这一年里，中国政府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要求，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高尚全被任命为预委会委员、经济小组组长。经济组在内地与香港委员共召开了21次专题小组会议，举办了两次座谈会和两次大型研讨会，完成了7份课题研究报告，提出了12项建议和意见，对“九七”前后香港经济存在的重大问题和发展趋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繁荣稳定贡献了一份力量。

1996年高尚全在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兼经济小组组长时，担心香港在金融上出问题，从而影响香港回归祖国。他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高度，极富预见性地提出密切注意国际汇市动向、防止国际游资冲击港元的对策建议。他和他在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在一份名为《汲取欧洲及墨西哥货币危机教训，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东南亚国家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和政治的不甚稳定，很容易使其货币成为这股投机势力冲击的目标和猎物。这股投机势力财力雄厚，蓄势待发，伺机而动，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绝不可掉以轻心。”“面对这股猖獗的国际投机汇商，有可能企图利用港元兑美元的固定联系汇率以狙击港元，我国政府、香港及亚洲有关当局应高度戒备，严阵以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让这些敢于入市的投机商遭受重创，或知难而退。”报告还建议：“在增加和预留必要的外汇储备以及结合外汇储备的最终用途，合理地安排币别结构的基础上，联手达成一些预防性和补救性措施，在必要和危急的时候，以更强大的力量干预外汇市场。”

这个报告上报中央领导同志后，立即得到高度重视，并及时指示有关部门阅办。一年后，高尚全的这些判断应验了。1997年出版的《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在1996年就指出，要密切注意国际汇市中游资的动向，提防东南亚货币成为这股投机力量狙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位置日益重要。1995年7月，高尚全被正式任命为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委员。该组织由24个国家的专家组成，要求本人必须是熟悉本国经济发展和外国经济情况的高层次的官员或学者，不少专家为本国总统经济顾问；其主要任务是每年发布联合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看法。高尚全教授是由中国政府推荐、联合国秘书长提名、经社理事会全体会议通过而任命的，他接到了联合国发来的贺信。

这样，在从事改革十多年之后，高尚全教授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为香港回归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殚精竭虑、贡献余生。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高尚全，任重而道远，他以敏捷的思维、渊博的学识、突出的贡献、平易近人的风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信任，也由此结识了无数的朋友，上至中外著名国家领导人，下至国内外新闻界、工商界、学术界朋友。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碰到各色皮肤、各种语言的朋友，他们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中国的改革，认真地与高尚全教授进行探讨。在某种意义上，高尚全成了外国朋友眼里的中国改革家的象征；他的名字也多次被收入世界“名人录”。

由于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突出贡献，高尚全 1993 年曾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奖励；1994 年又获香港理工大学旨在弘扬学术、促进交流的首届“中国杰出学人”奖励，共有包括工程、医学、生物、经济等领域的 6 位内地专家学者获此殊荣。

明确提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并力主将“民主”、“自由”、“人权”写入十五大报告

1997年，围绕着国有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不断。那时候，社会上出现的所谓“万言书”集中对市场化改革以来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算总账。高尚全也得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的帽子。

高尚全在参加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时，负责所有制改革部分。针对 90 年代以来关于股份合作制经济姓公姓私的种种争论，他提出要努力致力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必须通过所有制理论的发展为新一轮改革和发展提供动力；在肯定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也必须确立。只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才能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明确提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

济，要致力于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的建议，被十五大报告吸纳。经过经济学家与决策者的共同努力，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为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十五大也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这部分本来由另外的同志负责起草。但高尚全在看了草稿后却发现这一部分没有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他就此询问相关同志，得到的答复是：“没地方了。”后来起草小组开大会的时候高尚全发了言，建议要把“自由”和“人权”写到报告中去，并讲了三条理由：

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宪法》上提出要有这样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同志的赞同。所以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后来温总理在“两会”回答记者的时候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由政府主导的“官本经济”到“人民本位论”，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2001年，针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的问题，高尚全系统地提出了“以民为本”和“民本经济”的理论，论述了民本经济（即老百姓经济）的基本特点、对于深化改革的作用等。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重要体现。

第二，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